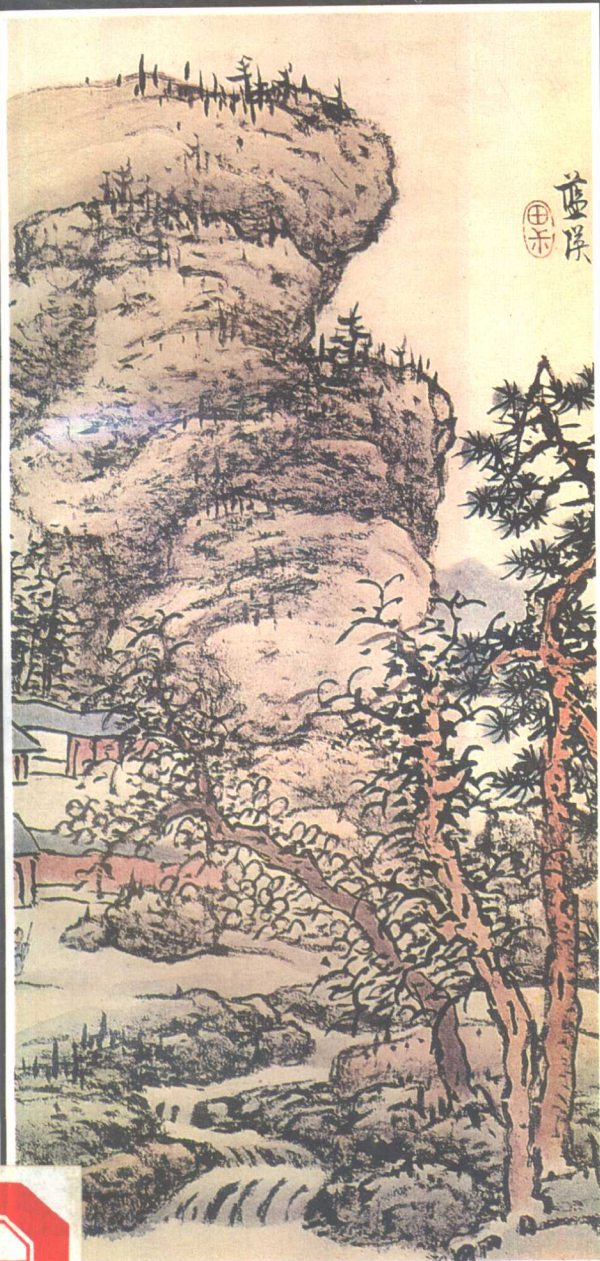


明人小品十家

钟伯敬小品

刘良明选注

文化艺术出版社



钟伯敬小品

刘良明选注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0 号

钟伯敬小品

刘良明选注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 1201 工厂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875 字数 150,000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7-5039-1449-1/I·622

定 价: 11.80 元

出版说明

在古代,“小品”一词并不具备明显的文体意义,它仅是六朝时称谓佛经略本的词语,所谓“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

在佛经以外使用小品一词,集中出现于明代中叶以后。田艺衡有《煮泉小品》朱国祯仿宋洪迈《容斋随笔》之体,撰成杂记见闻式的《涌幢小品》32卷。以小品名集,则有陈继儒《晚香堂小品》、潘之恒《鸾啸小品》、王思任《谑庵文饭小品》等。以小品作选本之名,则有《皇明十六家小品》、《国表小品》、《闲情小品》等。是小品,自然要篇幅短小,但这只是其外部特征,小品还有其不容忽视的内在特质。晚明公安派性灵说的提出、竟陵派幽情单绪的倡导,都为小品内在品格的提高贡献出不可或缺的力量。散文小品之所以至晚明大放异彩,与时代风会密不可分,可视为一种文体的自觉,它仿佛是传统散文中的轻骑兵,到处驰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踪迹。

明人刘士麟《文致序》曾谈到小品的“无意”之境:“故从来文词家,代不乏人,惟无意于文者往往极其致。如昔淳于、优孟辈,彼其澜翻舌底,何尝有意为文,乃仰天笑而冠缨绝也,摇头歌而临槛疾呼也,能使暴者颐解,怒者粲发,文章之妙,莫过于此。”近代学者俞平伯也有类似的看法:“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这个通例,于小品文字的创作尤为显明。”(《重刊浮生六记序》)小品属散文一脉,

2 钟伯敬小品

但又有超越文体的特征，举凡人事杂记、山水游记、祭文序跋、日记寓言、清言赠序、传记尺牍、笔记诗话等等，皆可在小品的旗帜下找到各自的位置。

明人小品独抒性灵，顺应了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谈艺论文，妙趣横生；点染山水，情韵盎然。明人小品寻觅着心灵的洞天福地。包罗万象，尺幅千里；言近旨远，别有寄托。明人小品记录着一代文人的足迹。“我要一套好藏书，几本明人小品，壁上一帧李香君画像让我供奉，案头一盒雪茄……”，三十年代的林语堂在《言志篇》中作如是说。

明人小品在三十年代曾哺育了一代散文大家，在今天散文与小品方兴未艾的热潮中，仍将输送有益的养分给作家，给一切感兴趣的读者！我社立足于现代人的广泛需求，分别选取徐渭、汤显祖、陈继儒、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钟惺、王思任、谭元春、张岱的小品文，加以注释。并以各家字号为书名，以求得形式的整一，总名为《明人小品十家》，以飨读者。

这套精选精注的小品丛书，将带你走入一个五彩缤纷、光采耀人的奇妙世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前言

这本《钟伯敬小品》是晚明文学家钟惺所作散文小品的选集。

钟惺（1574—1625），字伯敬，号退谷，别号退庵，湖广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县）人。他的祖籍本为江西吉安府永丰县，至高祖钟协祚始由永丰迁移至竟陵县皂市（今天门皂市镇），几代乡居。曾祖钟弘仲是一位贫寒、质朴的农民。祖父钟山则性格警爽、颇有胆识。见家境清苦，于是外出经商。稍积资产，方“构宅买田，有中人产矣”（见钟惺所撰《家传》，以下述其家世，皆本此文），并被当时的荆西兵备观察郑汝舟任命为团长，协助管理乡里治安。由于家境稍裕，钟惺的父辈开始读书出仕。生父钟一贯为贡生，曾官武进县训导。钟惺幼从塾师受业，嗣父钟一理（为生父之长兄、无子，故以钟惺为嗣子）及生父亦授以经史古文及制艺。钟惺18岁补诸生，而12年后至20岁时始乡试中式，为举人。37岁成进士，授行人司行人（掌传旨、册封等事务），一官8年，迁工部主事，后改南礼部仪制司主事、迁祠祭司郎中，浮沉于冷官闲曹。至49岁擢福建提学僉事，到任未及半年，丁父忧去职。两年后病卒于家，享年52岁。

终伯敬之世，未为显宦。加以生来“貌寝”，“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谢人事”（《明史》本传），而勤勉好学、潜心著述，并敢于针对文学发展历史与现状直抒己见。早在27岁为诸生时，他与文友论诗，就断言“明诗无真初、盛，而有真中、晚，真宋、元”（见《明茂才私谥文穆魏长公太易墓志铭》）。31岁时，钟惺与少于自己13岁的同邑文友谭元春订交。二人常相同游唱

和，讨论诗文，逐渐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主张。41岁时，钟惺与谭元春合作编定《诗归》一书，标举自己的文学理论观点。三年后，是书刻成，钟惺与谭元春各作《诗归序》一篇，“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以驱驾古人之上”（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钟提学惺》）。“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钟谭体’”，“所撰《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父（孔子）之删定”（同前），乃至当时就有人模仿他而作“拟钟伯敬体”的诗文。

钟惺获得的显赫声名是与明代文学发展变迁的状况密切相关的。明朝自开国之初，由元入明的宋濂即强调文章应明道致用，提倡宗经师古。与宋濂约略同时的诗人高启论诗也主张“兼师众长，随事摹拟”（《独庵集序》），开拟古主义先声。稍后，高棅于永乐年间编选《唐诗品汇》，分唐诗为初、盛、中、晚四期，并极力推崇盛唐之作，影响十分深远，“终明之世，馆阁以此书为宗”（《明史·文苑传》）。永乐以后，封建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社会大体稳定。适应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的需要，以先后辅政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应运而生。“台阁体”诗文内容多为歌功颂德，体制风格以唐人为宗。“三杨”之后继主文坛的李东阳论诗也有复古倾向。总之，明初至此，虽诗文多变，但有的派别文学作品内容贫弱；有的派别文学主张杂而多端，因而严重阻碍了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引起了不少有见识文士的不满。

适逢此时，复古的潜流经过长时期的萌动与酝酿，终于在弘治年间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运动。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主张。他们对“台阁体”等前此萎靡不振的文风进行了抨击，而欲以古代诗文的高格逸调来纠正那种不良习气。在他们及其追随者的鼓吹下，百馀年来的诗文创作及理论批评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何之后，约当嘉靖年间，又有李攀龙、王世贞

为首的“后七子”继起，他们推尊李、何，同样主张诗文应当效法汉魏、盛唐，把复古运动又推向一个新高潮。

然而，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往往忽略古人诗文中的现实思想内容，片面地强调从形式上机械地摹仿古人。这点在他们内部的成员中也引起过争论，其主要首领到晚年也有所觉察，而且拟古的诗文已不适应发生了变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嘉靖、隆庆以后，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东南一带当时生产力较为发达的地区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生产日趋兴盛、城市日益繁荣、市民阶层迅速扩大。他们不仅有着自己的经济要求，而且在思想领域与文学领域也提出了自己的新要求。当时富有异端色彩的思想家李贽堪称市民阶层思想的代表。他竭力抨击传统封建思想，鼓励人们挣脱儒家经典的桎梏，启发人们大胆地独立思考。在文学方面，李贽猛烈批判复古主义，提出“童心说”，主张描写自我“绝假纯真”的“本心”、“真心”（均见《童心说》），这些主张都有着积极的开创意义。

在李贽的号召和直接影响下，湖广公安（今湖北公安县）的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于万历中期首先崛起，发动文学革新运动，世称“公安派”。其中以袁宏道（字中郎）作为主将，贡献最多，影响最大。“公安派”认为时代在不断变化，语言、文学也相应日益发展。他们抨击了当时复古倒退的不良风气，要求文学不断变革与创新。他们还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口号，主张诗文创写作抒作者的真情实感及个人的独得之见，反对虚伪矫饰、剿袭模拟以及任何形式的束缚。“中郎之论出，王（世贞）、李（攀龙）之云雾一扫”（《列朝诗集小传·袁稽勋宏道》），复古主义的营垒被彻底摧毁。

只是“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也有一定的局限，他们不适当地鼓吹“不拘格调”，乃至到了过分的地步，其末流更忽视艺术修养

的提高,丧失了创作时应有的严肃认真态度,导致作品俚易浅率。在这种情况下,钟惺、谭元春(主要是钟惺)起而创为新论。他们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模拟,张扬性灵之言。在这方面,他们的主张与“公安派”有共同之处。事实上,钟、谭也都非常景仰袁宏道。钟惺曾编定《袁中郎全集》;谭元春也曾为《袁中郎续集》作序,皆以袁氏知己自命。但另一方面,钟、谭对“公安派”末流的弊端也感到不满,认为当时人们在模仿袁宏道的道路并警争驱,与当年模仿李攀龙一样,都是要不得的。在《诗归序》里,钟惺提出了“求古人真诗”的号号,以此来克服前后七子与公安派两派的片面性。在不少文章及与朋友的书信中,他不只一次谈到这个观点:“常愤嘉、隆间名人,自谓学古,徒取古人极肤、极狭、极套者,利其便于手口,遂以为得古人之精神,且前无古人矣。而近世聪明者矫之曰:‘何古之法?须自出眼光。’不知其至处,又不过玉川、玉蟾之唾馀耳。”(《再报蔡敬夫》)在对前后七子与公安派的末流都失望后,钟惺正面道出了他的诗歌理论主张:“夫诗,道性情者也。发而为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不得已而有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性情之言也。”(《陪郎草序》)这说明进行诗歌创作必须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实质相近;也与我国古代诗论中源远流长的“诗言志”、“诗缘情”等传统观点精神相通。

然而,如果仅有以上这些议论,那么还流于一般化,钟惺、谭元春是难以开宗立派的。钟、谭的突出贡献在于他们对于诗歌创作规律更为深入、独到的认识与阐发。钟惺《诗归序》中的一段话集中代表了他们的观点:“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这就是说,钟惺心目中的优秀诗歌作品“真诗”乃是人们在喧闹烦杂的现实生活中,以一种超凡脱俗的怀抱、坚忍精进的毅力,将自己的精神思想遨游于虚无缥缈的悠远广漠之外,从而抒写自己

幽深孤独的情绪，表达自己独特寂寞的寄托。这里要求诗歌作品写出诗人独特的情绪与感受，无疑是合理的。钟、谭对于诗歌艺术刻意深入的求索，正当公安末流“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之时，针对他们的偏弊，“竟陵代起，以凄清幽独矫之，而海内之风气复大变”（《列朝诗集小传·袁稽勋宏道》）。故此，钱钟书先生指出：“以作诗论，竟陵不如公安”；“然以说诗论，则钟、谭兴趣幽微，非若中郎之叫嚣浅卤”（《谈艺录·竟陵诗派》）。正因为钟、谭有如此超卓的诗论见解，所以他们创立的竟陵诗派才能风靡一时。而在钟惺身后不久，他的著作就已“流传海内，即鸡林毳窟，稍习笔研，无不购先生书者”（许彥《先师钟退庵文集序》）。直至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禛的诗论也受到他的影响。

历来有不少文论家理论上期望的目标甚高，而自身的创作往往难以达到期望的水平。钟惺以前的严羽、钟惺以后的叶燮等杰出的诗论家莫不皆然。平心而论，钟惺诗歌创作的成就当还在严、叶之上。因此，即使钟惺的诗作不如其诗论，我们也不应求全责备，何况全面考察钟惺的诗歌创作，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还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

我们在此要着重指出的是，钟惺的小品散文创作取得了较高成就，在文学史上有较大影响。清初文学家王士禛曾指出：“钟退谷《史怀》多独得之见。其评左氏，亦多可喜。《诗归》议论尤多造微，正嫌其细碎耳。至表章陈昂、陈治安两人诗，尤有特识。”（《古夫于亭杂录》卷五）以下，我们分别从不同体裁的小品散文入手，具体考察一番他的创作成就。

文学史上的钟惺主要是以一位文学理论家的面目出现的，因此，历来首先引起人们注目的钟惺散文是其中的文论作品。选入本书中的书籍序、诗文集序，以及部分书信大都具有文论的性质。除前举《诗归序》外，《东坡文选序》、《简远堂近诗序》、《周伯孔

诗序》、《问山亭诗序》、《隐秀轩集自序》、《先师雷何思太史集序》、《潘无隐诗序》、《潘稚恭诗序》、《陪郎草序》、《诗论》、《与高孩之观察》、《答同年尹孔昭》、《与谭友夏》等文都是文论研究者经常征引的篇章。它们或正面立论，宣扬竟陵派的文学观点；或旁敲侧击，批驳前后七子与公安派末流的偏弊，回环往复、相互照应，为竟陵派理论在当时驳杂纷争的文坛上取得主导地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本书选录的史论篇目也较多。据《明史》本传记载：钟惺“官南都，餽秦淮水阁读史，恒至丙夜，有所见即笔之，名曰《史怀》。”钟惺本人在《二十一史撮奇序》、《与熊极峰》等文中也提及此事，足见他对这一史论著作的重视。他死后十年，明末陆云龙评刻《钟伯敬先生合集》，在序言中论及其创作成就时写道：“乃读其诸论，不尝发左氏、班、马之未竟，钩其隐深而出之乎？冷眼颖心，真具史之才识。”前引清初王士禛亦有相似评论。今按之本书所选史论，如《郑庄公》一篇，行文有如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将郑庄公处心积虑杀害亲弟的狰狞面目，欲擒故纵的险恶用心一一揭发，充分暴露了统治阶层“凶而狡”的罪恶本质。分析深刻，语言犀利。《留侯》一篇则提出“子房用汉，非为汉用”的新见，发前人所未发，眼光敏锐。观此二篇，以概其余，可知陆、王二家的赞赏洵非虚誉。

钟惺的论说性作品中，《夏梅说》当是最广为人知的一篇。它也最为鲜明地显示了钟惺的文章不同凡响的特色。历来记写吟咏梅花作品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赞美梅花不畏雪压霜欺的傲骨，而钟惺却看到“冬春冰雪”，这正是它最受人们趋附娇宠的时候，“此其极热时也”。钟惺则属意于夏梅“叶干相守，与烈日争”时的“冷极”，可谓洞隐烛微，标新领异，充分展现了深幽孤峭的竟陵风格。末段更由写梅而论及世事，感慨喟叹，恍然可见作者“严冷”的风骨，真乃文如其人。

钟惺的为人并不总是“严冷”，他其实很重亲朋友谊，热情提携后进，对处于社会底层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富于同情。这点从他有关描写人物的传记、赠序、墓铭、祭文等类文章中看得非常明显。叙写诗人陈昂事迹的《白云先生传》即前举王士禛大加赏拔而谓见其“特识”的作品。文中用简练的语言、白描的笔法叙述了陈昂的一生。不过寥寥千言，而一位老诗人清贫拮据的生活、困顿窘迫的处境、坎坷屈辱的经历无不展示于字里行间。尤为感人至深的是，虽在穷愁潦倒之中，陈昂仍然执着地进行诗歌创作，直至生命的终结。作者对陈昂的悲惨遭遇寄予深挚的同情，并设身处地揣摸诗人面对种种艰辛苦楚时，“胸中皆作何想”，从而激发读者的联想与想象，令人仿佛看见一位“老贱晦辱”的诗人就站在自己面前。类似此篇，还有写坎壈终身的好友魏象先的《明茂才私谥文穆魏长公太易墓志铭》；写敏感多才的女诗人尹纫兰的《断香铭》；写自幼目盲的诗人唐汝询的《赠唐仲言序》等篇，都能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写出他们的音容笑貌；传达出他们栩栩如生的精神风采，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而哀悼相从未久的良师雷思霈的《告雷何思先生文》、痛惜才秀早夭的爱子肆夏的《告亡儿肆夏文》，更如泣如诉、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钟惺看重友谊，提携后进更集中体现在他与友人交往的书牋中。书牋类所选首篇《报蔡敬夫大参》，作者就向蔡复一极力推荐名辈次于自己的朋友谭元春。不仅热情地称许这位“异人”比之自己乃“十倍曹丕”，而且将其诗集转赠蔡复一，揄扬、赞美之语不绝于口，大有“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唐诗人杨敬之语，见《唐诗纪事》）的古君子之风。这在文人相轻陋习风行的封建时代，是多么难得！推崇、提携并非无原则的吹捧，而是在对友人的眷顾关怀之中又包含着殷切的期望与谆谆规诲。这点在与谭元春诸书中表达得最为明显。书中不仅多处流露出“不觉倍责之而厚望之”的复杂感情，乃至引用苏轼写给胞弟苏辙的诗

句“与君世世为兄弟、愿结来生未了缘”，说明这种良好愿望之难以实现，而当更重今生情谊。

钟惺不仅对于相知甚深的挚友关怀备至，而且对于关系未必很密切的朋友也热情真诚，尽力予以援手。在书牍类次篇《与徐惟德宪长》中，他替一位“贫老”的朱翁代言难言之隐，为朱求助。虽然钟惺自谦“口惠无实”，但这种扶危济困的仁爱之心也是难能可贵的。

史称钟惺“不喜接俗客”，实际上他更不喜发“俗言”。文学家陈继儒是当时誉满东南的大名士，且年辈长于钟惺。但钟惺与他初识后给他的信中，却对朋友相识时常说的客套话“相见恨晚”发了一通议论，认为倘若他们早十年相见，彼此的“识力”尚未“坚透”，不如成熟以后相识，相互之间的启发更多，故尔交友有益，相见不必恨晚（《与陈眉公》）。言简而意深，颇为启人神智。

书牍中许多篇章这种构思幽邃、出语警峭的风格特色，也显现在钟惺的题跋之中。题跋是典型的小品文字，内容可随意挥洒，最易见出作者的个性。书中选入的《自题诗后》借友人李长叔的一段话大加发挥，对当时“不读书，不作诗文”而滥充名士的文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文章前段寄慨于“胸中书太多，诗文太好”者尚深藏若虚，而滥竽“名士”则大行其道，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后段则表示世风虽如此浇漓，而自己仍将坚守善道，执着于文学事业，精神更为感人。

《题潘景升募刻吴越杂志册子》一文也对当时与上文相似的文化现象颇致感慨。晚明时代，东南吴越一带为人文渊薮，文化出版事业非常发达，甚至使得当时的“俚恶诗集，阉咽国门”。然而，作者的友人潘之恒所辑的《吴越杂志》命运却大不一样，尽管它是一部“事辞深雅，心力精博”的好书，可“募刻于好事者，而多不能给”，真可谓鱼目混珠，而明珠暗投，两相对比，何等不同！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着实令作者为之痛心扼腕，然而痛心扼腕又于事何补？钟惺只得在篇末聊以自解，而给读者留下一篇在商潮冲击下，高雅文化日趋式微的古代记录。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钟惺所写的“记”。本集中的“记”大体可以归入游记一类。钟惺所作游记仅见寥寥数篇，远不如袁宏道所作之多。然篇幅虽少，亦自有其特色。如为人所熟知的《浣花溪记》写作者游览浣花溪、杜工部祠的情景，以游踪为顺序，次第叙写。既描绘了浣花溪及沿岸“水木清华”的清新幽美景色，也叙述了自己“神肤洞达”的亲身感受，令人想见其厌弃“冠盖稠浊，磬析喧溢”的俗恶而“偶然独往”时闲适优雅的情趣。

钟惺是一位擅长绘事的画家。清初著名画家恽寿平（号南田）曾评其画曰：“伯敬先生画宗逸品，绝似宋之人一派，笔致清远，有云西天游之风。”又谓：“伯敬盖得之于诗”。（均见《瓯香馆集》）艺理本有相通之处，恽寿平认为钟惺的绘画得力于诗歌的意境，我们也可看到钟惺的游记融入了画意。如《浣花溪记》开头一段：“西析纤秀长曲，所见如连环、如玦、如带、如规、如钩；色如鉴、如琅玕、如绿沉瓜。窈然深碧，潏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比喻形象，设色明丽，俨然画图。

出语精当，刻画生动的篇章在钟惺的游记还有不少。如《中岩记》里写中岩山“诸峰映带，时让时争，时违时应，时拒时迎，……”，化静为动，令人读之，似觉无知之山峰皆若有情，想象奇特。再如《梅花墅记》中写园林里的池水又与浣花溪中的流水不同：“林木荇藻，竟川含绿，染人衣裾，如可承揽。”都能准确地捕捉景物各自不同的特征，而加以生动形象的描绘。

钟惺的著述，除与谭元春合编的《诗归》在当时及后世影响深远外，两人又合编有《明诗归》。钟惺还编有《名媛诗归》、《周文归》、《宋文归》，又著有《毛诗解》、《五经纂注》、《钟评左传》等。他本人创作的诗文则大部收入《隐秀轩集》中。“隐秀轩”是

钟惺的书室，筑于钟氏故乡竟陵皂市五华山。它的得名出自南朝文学家刘勰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其书有《隐秀》一篇云：“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又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其佚文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大体看来，“隐”与今人常说的婉曲含蓄相似，“秀”则与常说的警策生动相通。钟惺对“隐秀”的境界别有会心，故不仅取为书室之名，又作为文集之名。

我们的这本《钟伯敬小品》即选自《隐秀轩集》的散文部分。考虑到它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广大的古典文学爱好者，所以在选文时，我们注意多选一些文学性较强的篇目，如书籍序、诗文集序、记、论、书牋、题跋等类中的作品，而对于一些应酬文字如疏、碑、赠序，墓志铭就不选或少选。选录的底本采用钟惺自己编定而其友人沈春泽天启二年（1622）序刻的《隐秀轩集》，并对选文中的字句进行了必要的校勘，然后以分段、标点。再将原书中的繁体字、通假字、异体字统一为目前通行的简体字，以便广大读者阅览。选文的类别及篇目的排列顺序悉依原本，必要时，读者可与原本参看。

整理本书的最大困难是注释部分。据笔者所知，《隐秀轩集》向无笺注疏释之本，筌路蓝缕，以启山林，其难可想而知。虽笔者勉力为之，然以学识浅陋，又仓卒成稿，疏漏必多，敬祈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在整理本书过程中，朱迪卓、武丽娟二位学友多所关怀，谨此致谢。

刘良明

1996年6月1日

明人小品十家

徐文长小品

汤若士小品

陈眉公小品

袁伯修小品

袁中郎小品

袁小修小品

钟伯敬小品

王季重小品

谭友夏小品

张宗子小品

责任编辑:李世耀

封面设计:关明